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李达卷

宋俭
宋镜明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宋俭
宋镜明
编

李达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李达卷/宋俭, 宋镜明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00-19901-6

I. ①中… II. ①宋…②宋…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李达 (1890~1966)-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5771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李达卷

宋俭 宋镜明 编

Li Da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张 35 插页 2

字数 563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湖南省零陵县（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890年10月2日，李达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岚角山镇一个佃农家庭。幼年随义父胡燮卿在零陵、江华、嘉禾等县读私塾，1905年考入零陵的永州中学，1909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两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回到家乡，1912年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习。

1913年，李达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公费生，入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理科，但不久即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初，再次东渡日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帝国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帝国大学理科。受十月革命影响，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5月，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并率留日学生救国请愿团回国请愿。请愿失败后，于同年6月再赴日本，毅然放弃理科学习，专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潜心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此期间，他开始翻译郭泰^①的《唯物史观解说》、

^① 即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曼·果特。

柯祖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①和高阜素之^②的《社会问题总览》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后在国内出版。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续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分析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并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③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9篇文章，向国内介绍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

1920年夏，李达由日本回国，立即投入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同年8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此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1月，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出任主编，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刊，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批判机会主义。李达为办好该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最困难的时候，他独自承担着从撰稿、审稿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新青年》杂志自第8卷起改为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刊物，李达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李达积极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并旗帜鲜明地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假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

李达从日本回国不久，即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道，投入到反对以梁启超和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他先后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

① 柯祖基即考茨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发表的《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一文中认为，李达并没有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

② 《资本论》的日译者。

③ 李达：《社会主义的目的》，载1919年6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任公》等文章，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并把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批驳了梁启超、张东荪等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的观点，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还从正面论述了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而不能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等重要思想主张，在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反对假社会主义思潮的同时，李达又投入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在中国的传播也早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着优势。从1919年到1921年，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成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严重思想障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李达在这场论战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将，他先后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批驳了其“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观点，指出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①，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澄清了无政府主义制造的思想混乱，这场论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比较准

① 李达：《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载1921年5月7日《共产党》第4号。

确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免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需要指出，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发表的一系列论著，还没有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发展道路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是那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局限。但他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阐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李达作为中国最早系统阐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他所从事的理论著述和宣传活动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二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李达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工作，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委托李汉俊代理党的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由于与陈独秀意见不合，1921年2月，李汉俊辞职，由李达接任代理书记职务，主持党的上海发起组工作，并具体负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讨论建党事宜，并在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商议后，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东京的党组织派代表到上海开会，亲自负责接待到沪的各地代表，安排代表的住处，落实会议会场。7月23日至31日，他与李汉俊作为上海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李达负责会务工作，参与会议文件的起草，并被选举为中央局宣传主任。8月，他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1921年9月，李达主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李达为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他革命书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著译书稿外，他还经常“一人承担”编辑、付印、校对、发行工作，在一年内，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①、《资本论入门》、《列宁

^① 即《雇佣劳动与资本》。

传》、《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等15种革命理论书籍。^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②的情况下，李达主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作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22年7月，李达以党的一大中央局代表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认为“马列主义理论仍须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自己“还是去专心研究理论为好”^③，“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④，遂离开中央机关，专心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用笔杆子来作战”。

同年11月，李达应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自修大学设有文、法两科，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李达主持全校教学工作，负责“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⑤，并辅导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为学员系统讲授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

1923年4月，李达与毛泽东一道创办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并出任主编，《新时代》共出4期，每期印2000份，李达在该刊先后发表《何谓帝国主义？》、《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译文）、《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等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年8月，他在湖南《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连载发表长文《社会主义与江亢虎》，批判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鼓吹的所谓“新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官僚的社会主义”、“走狗的社会主义”^⑥。

1923年夏，李达由湖南至上海与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就国共合

① 李达当时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共产主义）丛书”11种和其他理念书籍9种，包括恩格斯的《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个出版计划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实现。

② 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1期，1928年1月。

③ 《李达自传（节录）》，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④ 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1期，1928年1月。

⑤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载《新时代》第1卷第1号。

⑥ 李达：《社会主义与江亢虎》，载湖南《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1923年8月14、15、17、19、21日。

作问题交换意见。此前,1922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决定了采用“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李达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不同意“党内合作”的形式,而主张党外合作,保持党的组织的独立性。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致不欢而散,李达“当时即已萌芽了脱党的决心”,并“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①。回到长沙后即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同年秋,他在组织上脱离了中国共产党^②,李达后来称这次脱党是自己“平生所曾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最严重的、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③。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继续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并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他仍然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强令解散后,李达转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任学监兼教授。他以社会学的名义向学生讲授唯物史观,并将编撰的讲义题名为《新社会学》,1926年6月,由湖南现代丛书出版社正式出版,定名为《现代社会学》。该书共18章,前13章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后5章系统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1933年即印行14版,成为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必读之书。

国民革命时期,李达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同时,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后,李达出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并一度代理政治总教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初,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到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

① 《李达自传(节录)》,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② 关于李达脱党的时间有不同说法:据李达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重新入党时写的自传是1924年9月脱党;1956年3月,李达在另一份自传中说是1924年初;李达在1928年7月《现代中国》第2卷第1号发表的《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一文中则说是1923年秋退党,此说与《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日刊登的《湖南李达号鹤鸣启事》关于脱党时间的说法基本一致,故取此说。

③ 参见宋镜明:《李达传记》,7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动讲习所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7年3月,回湖南担任由中国共产党人筹办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教育长。

“马日事变”发生后,李达一度避居零陵乡下。1927年9月底应李汉俊之邀至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2月,李汉俊在武汉惨遭国民党军阀杀害,李达脱险后避居上海法租界,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8年冬,李达在上海与熊得山、邓初民等合作创办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革命书籍。1929年,李达的三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出版:一是《中国产业革命概论》,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该书援引国内外的大量统计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唯一前提”。该书被认为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二是《社会之基础知识》,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发行。该书是李达分析中国社会革命问题的又一部重要著作,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解剖了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征,并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前途,指出,中国的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①。三是《民族问题》,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该书概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强调民族问题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分析了民族问题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枢纽”^②。该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民族问题的著作。1930年,上海昆仑书店还在中国首次出版了陈启修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李达译《政治经济学批评》^③和钱铁如译恩格斯《反杜林论》(上册)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2年,李

① 《李达文集》第1卷,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② 《李达文集》第1卷,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③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在《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发表的《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二——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辨》一文中认为,李达并没有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达又以“王啸鸥”的名义在上海创办笔耕堂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实际上编辑、出版、发行都只有他一个人。

在上海期间，李达还翻译了许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主要有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山川菊荣的《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与人合译的有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拉比拉斯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对于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2年5月，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委托，李达与陈豹隐、邓初民、宋斐如等到泰山给爱国将领冯玉祥和他的研究室讲授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新政治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些课程对于冯玉祥日后的政治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次年5月，李达又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委托，到张家口再次给冯玉祥授课，讲授辩证逻辑，并动员冯玉祥联共抗日，帮助其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后来，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2年8月，李达由上海到北平，应聘担任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同时还兼任朝阳大学等校教授。北平大学和中国大学因为当时聚集了李达、黄松龄、吕振羽、齐燕铭、侯外庐等一批“红色教授”，时有“红色大学”之称，而李达更被称为是中国大学“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①。李达在北平期间，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货币学、历史学等方面，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如《社会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译著）、《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政治经济学教程》（译著）、《社会进化史》等。其中他与雷仲坚合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年在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后，很快流传到延安，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该书，并“写下了近一万三千字的批评”，被认为是毛泽东曾经“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书”^②。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在北平期间写成的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

①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载《文献》，1980（4）。

② 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4）。